

Review: When Valleys Turned Blood Red: the Ta-pa-ni Incident in Colonial Taiwan^{*}

張家綸^{**}

一、前言

康豹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畢業，現職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。研究領域包括：中國宗教社會史、臺灣宗教社會史、中國道教史，著有：《臺灣的王爺信仰》、*Images of the Immortal: The Cult of Lü Dongbin at the Palace of Eternal Joy*，以及數十篇論文。近年來積極搜尋坊間戶籍資料，如最近申請通過的「南投縣烏牛欄庄的族群關係與產業變遷計畫」，其中的研究成果之一在「歷史視野中的中國地方社會比較研究研討會」中發表，本書即利用戶籍和口訪資料，試圖檢視殖民政策和地方結構之間的互動。

* 目前學界關於本書的書評，有張隆志，“Review of Paul Katz, *When Valleys Turned Blood Red: The Ta-pa-ni Incident in Colonial Taiwan*,” *Pacific Affairs*, 79:1 (spring, 2006), pp. 115-117.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及蔡錦堂教授、學友曾令毅、黃婉琪等人提供寶貴意見，特此致謝。
收稿日期：2009年1月19日；通過刊登日期：2009年5月21日。

**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

二、簡 介

本書旨以「噍吧哖事件」為中心，試圖檢視殖民政策與地方之間的互動和轉變。作者在導論中指出，該研究目的有三：一、試圖用Paul Cohen《歷史三調》¹的概念檢視噍吧哖事件。二、探索此事件以思考日本早期殖民臺灣的政策是否成功，又該事件如何影響了後來的殖民政策。三、將臺灣過去被殖民的事實，放置在世界學術平臺上探討（頁7）。首先，作者欲從社會史的角度研究殖民主義，亦即藉由探索南部深山的居民如何反抗殖民政權，並思索宗教信仰如何有助於組織反抗武裝團體的行動和策略（頁15）。再者，作者試圖探討殖民政府和地方社會之間的關係，他認為臺灣和其他的殖民地中，殖民政府的治理性（governmentality）是經由不同形式的知識製造，如人口學、統計學、民族學（頁16）。此外，作者還運用國界化的概念（territorialization），用以解釋殖民政府控制自然資源和人群的手段。將這些具體地描繪在地圖上，表現出有別於本土社群「經驗空間」的「抽象空間」。

作者接著探討史料運用的問題，除了歷史文獻和檔案外，還配合戶籍資料和口述訪問。作者指出：運用檔案時會遇到語言上的問題，亦即被訊問的人雖用閩南語和原住民語言表達，文獻卻是用日語來記載，這其中會不會出現翻譯上的問題（頁20）？而且檔案也並未指出嫌疑者的明確背景，特別當他是農家時，很難分清楚是地主還是佃農。這類的資訊和戶口資料結合後，可用以探討村莊的社會經濟結構，人口消長以及參與抗日的理由（頁21）。

第一章：背景。為了考察事件發生的原因，必須從殖民政策全面探討，包括：司法體系、警察與保甲制度、戶口調查、土地調查、林野調查、經濟政策。這些均改變了地方菁英和民眾的生活，皆是促成西來庵事件的原因。此外，本書舉出事件

1 柯文（Paul Cohen）以義和團為例。認為須分事件、經歷和神話三個層次，來探討並陳述該事件的各種面貌。事件為史家重建的歷史，可瞭解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；經歷為當事人的經驗，可展現當時不同人的感受；神話是後人對於該事件的想法，所引發的神話化過程，及其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。柯文認為這三者都各有其存在價值。事件歷史具有全面性，經歷可呈現史家無法持有的感情，神話則能協助人維持人格的完整性。詳見Paul A. Cohen, *History in three keys: the boxers as event, experience, and myth* (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97)。

前抗日的幾位人物，認為：第一，不能過度簡化起事者的動機，刻意要將他們擺至政治正確（politically correct）的架構裡（頁54）。第二，領導人和隨從之間都有複雜的社群關係（頁57）。第三，這些反抗行動都有一些祕密社會中千禧年信仰和行動的特徵（頁59）。上述這三點，也深刻地反映在噍吧哖事件中。

第二章：準備抗日（Preparations for Rebellion）。除了介紹起事者的背景外，尚包括招募的過程、參與的成員和原因。尤其招募者和參與者之間的關係，可以解釋為何動員臺南廳和阿猴廳的十五個村莊成員特別順利。透過這些敘述，作者指出：盡可能不要將參與的原因歸於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，而是更平凡的因素，如對於稅制、專賣權和林地徵收的不滿（頁90）。

第三章：宗教（Religion）。噍吧哖事件又稱西來庵事件，西來庵的宗教型態並非齋堂也非鸞堂，而是瘟神廟。在地方菁英長年的經濟援助下，西來庵的規模漸趨茁壯。雖然透過經書的宣傳拉攏信徒，但是這些經書中並未有任何抗日的思想，就連千禧年的信仰也不過是一本經書（《志祖師救現劫真經》）。此外，就入會儀式來說，如吃素、立誓、祭旗與千禧年信仰共存的現象，為該事件之重要特徵。

第四章：環境（The Setting）。就自然環境而言，多山、氣候濕熱的環境，影響當地作物的類型，並主導該地的經濟結構。就人文環境而言：第一，人口方面有漢人、平埔族（如四社熟番）和高山族（如曹族），這些族群都有參與事件的紀錄，惟獨崗仔林的平埔族較少參與，這是因為當地信奉長老教會的關係。第二，宗教方面包含漢人民間信仰、平埔族的阿立祖信仰以及天主教；最後，探討該地暴力的歷史淵源。從這幾個面向，作者認為當地特殊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型態是造成事件的主因，而余清芳等人正利用這種結構招募信徒。

第五章：東窗事發（Discovery of Plot and Battle）。

第六章：搜索與鎮壓行動（Seek and Destroy）。

第七章：正義的到來？（Justice？）余清芳等人原預定在1915年8、9月間起事，未料為了整備戰事而與中國的通信竟被日本政府察覺，於是事件提前爆發。一開始先突襲鄰近的派出所，進而屠殺警察及其家屬。1915年8月3日，抗日軍進駐臺南縣左鎮鄉內庄仔庄，余清芳和江定亦在此研擬了數項計畫：1.派民兵燒毀崗仔林

庄派出所。2.向神明請示隔天的行進路線、地點，決定往噍吧哖方向前進，最後攻占大目降和臺南市。雖然這些臨時的決定使得日本政府無法掌握抗日軍的動向，但是抗日軍決意攻擊警力雄厚的行政中心，卻是一大失策。果不其然，隔天經過一小時的鏖戰後，宣告抗日軍的攻擊失敗。日軍亦開始鎮壓這次的反抗，當時的一些屠殺行為，被殺害的對象主要以16歲以上的男性成年人為主，並未全面波及婦女、老人和幼童，相反地那些死亡的婦女或小孩，絕大部分是因病而死（頁191）。因此，大肆屠殺的情形或許是後世過度的渲染。

見此情況，江定等人始竄匿於山間，官方亦進行搜山的行動，但由於夏天天氣濕熱，加上村民不僅口供互相矛盾，引路時又時常帶著軍隊在山裡繞圈子，使得搜索行動一再延宕。至此，日軍改變策略，欲以軟硬兼施的方式追捕抗日軍。除了利用家屬脅迫他們外，亦以既往不究的口頭保證，以誘敵投降，直到1916年4月江定等人終於投降。

第八章：暴風雨過後（Aftermath）。就日本政府來說，由於1915年及往後幾年，這些地區的農作物收成還不錯，所以這次的抗爭對於政府的統治權及經濟利益並未造成負面影響。整體而言，從15個村莊在噍吧哖事件前後人口數的增減情形看來，在1913年和1914年之間，除了崗仔林庄、中坑庄、阿里關庄的人口呈現負成長之外，其他的村莊都有微幅的正成長。但從1915年7月到12月，15個村莊的人口總數大幅減少了3分之1，尤其在1915年這一年，除了芒仔芒庄之外，每個村莊的人口減少了10%以上。其中最為嚴重的村莊是阿里關庄，它的人口減少了61.2%，主要的原因是許多外地來的單身腦丁在噍吧哖事件後紛紛逃回家鄉。此外，因噍吧哖事件而人口大量減少的村莊，在事後很難回復至原有的人口水平，直到1920年代才開始漸漸回升。

至於死亡率問題。根據戶籍資料，1913年和1914年間，15個村莊的死亡率平均為1% 到 5%。但在1915年7月到1917年12月的短短半年內，竹頭崎的死亡率暴增到27.3%。其他村莊的死亡率也很高。就男、女比例來說，噍吧哖事件前，15個村莊平均男、女性比例為54:46，事件後則反倒為44:56，與事件之前相差10%。丈夫的死亡加上這不均衡的比例，使得許多寡婦不得不改嫁到附近未被波及的村莊。整體

而言，1915年7月到8月間的死亡人數很高，而且以成年男性為主，死因主要為陣亡或遭屠殺；9月到12月間的死亡人數雖有所減少，但大多為老弱婦孺，死因主要是病逝。總計1915年7月到12月間，約有1,789人死亡。

1945年日本投降後，村民積極進行許多紀念活動。例如，1977年臺南縣政府在南化鄉建立「噍吧哖抗日烈士紀念碑」，在1981年又在玉井鄉虎頭山樹立「抗日烈士余清芳紀念碑」。2003年，玉井鄉也建立了一座「噍吧哖事件紀念公園」。不過，最具意義的紀念方式可能是建立廟宇，用以供奉死難者的靈位。

三、評 論

（一）就史料而言

本書大量運用戶籍資料和口述訪問，與檔案文書相互驗證。尤其作者多年來與幾位助理進行田野調查，甚至尋找到江定的後代，對於重建下層社會的歷史，以及對該事件的歷史記憶，有莫大幫助。

（二）就論點而言

1. 本書多少受到《歷史三調》的影響，這對於解讀事件提供新的角度，包含歷史和經驗中的西來庵，雖然神話部分付之闕如。但這也是受到史料的限制，若能將這樣的論述方式，運用在其他的事件，相信會有不同面貌。

2. 本書不僅考慮到當時殖民政策下的政經結構，還討論當地的地理環境，如何影響當地菁英和民眾的生活，而未侷限於該事件，這對於為何爆發西來庵事件，提供了較為完整的敘述。

3. 作者從戶籍人口中，論述事件前後各村莊的人口增減情況，進而言及寡婦改嫁的行為，這在以往論述中甚少提及。

4. 由於資料的屬性，本書建立出與泛論中的西來庵事件不同面貌。例如：第一，在以往的論述裡，對於日軍的殘殺行徑多所描繪，但是透過這些資料的運用，

當時反抗軍亦有屠殺和掠奪的行動，而且對象也不僅限於日人。²第二，有論者視其為以夷夏觀念為基礎的民族運動，³但作者考察當地的政經環境，配合相關資料，認為加入者在自身利益受到波及下始參與。第三，對於日軍屠庄一事雖有發生，但限定在某些地方，而非全部的村莊。以往過於渲染該事，以致於建立出日本殘暴的印象。⁴而且有些人之所以死亡，是因為水土不服而死，這在過往論述中是少見的論點。第四，余清芳等人利用善書傳播抗日思想等看法，⁵作者重新考察善書後，認為未有此事，內容惟一宣揚末世觀念的是《志祖師救現劫真經》。

就運用技術來說，作者利用了GPS技術，還原當時搜索的路線。近來運用地理資訊系統為研究歷史提供了很好的工具，⁶作者透過衛星定位以及電腦繪圖，還原當時政府搜索行動為何受阻的原因。理由如簡介中提到，幾乎被村民帶著團團轉，這給予讀者較為清晰的解釋。

（三）幾點商榷

1. 對於名稱的混淆

筆者以為探討該事件時，首先要釐清歷來對於該事件的稱呼。有「西來庵事件」、「噍吧哖事件」、「余清芳事件」之稱，這幾個名稱不僅含義不同，出現的次序也有別。如「西來庵事件」爆發的時間先於「噍吧哖事件」，戰後又稱做「余清芳事件」，這點池田敏雄已有詳細的說明。⁷但檢視該書，當描述「噍吧哖

2 廖風德，〈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口供之分析〉，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》，第6期（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，1988年），頁105-127。

3 Paul Kantz, *When Valleys Turned Blood Red: the Ta-pa-ni Incident in Colonoal Taiwan* (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, 2005), pp. 149-155.

4 Paul Kantz, *When Valleys Turned Blood Red: the Ta-pa-ni Incident in Colonoal Taiwan*, pp. 191

5 Paul Kantz, *When Valleys Turned Blood Red: the Ta-pa-ni Incident in Colonoal Taiwan*, pp. 103；邱正略，〈日治時期戶籍資料的史料特色與利用：以西來庵事件研究為例〉，《臺灣史料研究》，第20號（臺北，2003年），頁94-118。

6 例如，2008年10月21日在國立臺灣大學舉辦的「數位典藏地理資訊學術研討會」，可見賴進貴等著，《數位典藏地理資訊學術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，2008年）。

7 池田敏雄，〈柳田國男と臺灣—西來庵事件をめぐる—〉，《國分直一博士古稀記念論集、日本民族文化とその周邊、歴史民族篇》（本書編纂委員會編，新日本教育圖書株式會社，昭和55年10月），頁465。

事件」和西來庵的關係時，似乎未細究兩者名稱的差異。

2. 事件原因之商榷

本書在做動機探究時，認為必須考慮到當地暴動的歷史淵源，歷來械鬥乃至漢番衝突，都是造成當地時常發生暴動的原因。不過這理由過於牽強，要說械鬥，北中南都有很嚴重的械鬥，要說漢番衝突，北中南也都有很嚴重的事件，那麼該論點是否可以套用至整個臺灣？因此若針對此點，不如將焦點擺在經濟因素上。當然，並非說本書都未探討經濟的問題，書中亦有提到人們是為了利益加入這場戰事，但是並未觸及該事件的問題核心。

這點早在池田敏雄撰寫〈柳田國男與臺灣〉一文中，即暗示了林野調查和「噍吧哖事件」的關係。⁸而周宗賢和李佳霖也強調該事件的經濟因素，⁹這正是探討該事件的新視角。重新檢視《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》，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。筆者將其中幾個相關描述以【表一】示之。

表一、《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》中與林野調查相關敘述表

被告	被告背景	訊問內容
李子龍	林圯埔支廳沙連保出鄉庄人	政府如前述，有聖人作皇帝，且可得田地，開墾地亦可自由開墾；但現在之政治太嚴格，不得擅自開墾，負擔亦重，輕微小事均不肯放過，因而夢想利益，使行入黨
葉連	林圯埔支廳沙連保內樹皮庄	據云新皇帝之政府成立，不徵收各種稅金，可以自由開墾伐採山林，利益甚大，自己信其言，故入黨
魏大肚	林圯埔支廳沙連保	由革命政府自由發放田地及森林、竹林等，相信以此私人生活計亦將得轉為豐裕。
劉永	林圯埔支廳沙連保	以其功勞之多寡，割賞山林田園，俾得安樂過日
劉牛	林圯埔支廳沙連保	臺灣被日本統治後，生計感到困難，各種法令繁雜，負擔亦多，故若能樹立革命政府，生計必定寬裕，開墾地亦得自由處分，萬事較之現在境遇改善甚多，且可多得利益，入黨目的即在此

8 池田敏雄，〈柳田國男と臺灣—西來庵事件をめぐって—〉，頁465。

9 周宗賢，《臺南縣噍吧哖事件之調查研究》（臺南：臺南縣政府，2000年）；李佳霖，〈武裝抗日下之農民運動：以西來庵事件為例〉（臺北：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6年），頁93-115。

資料來源：林衡道主編，《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（第一輯第二冊）》（臺中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75年），頁765；《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（第一輯第二冊）》，頁848；《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（第一輯第二冊）》，頁780；《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（第一輯第二冊）》，頁796；《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（第一輯第二冊）》，頁773。

另外參考當時的林野調查報告可歸納出【表二】。

表二、民有地所占比例

各廳	地目	民有地所占百分比
臺北廳	水田	59.4
	旱田	89.7
	林	1.03
宜蘭廳	水田	62.9
	旱田	70.8
	林	0.13
桃園廳	水田	92.0
	旱田	96.0
	林	14.5
新竹廳	水田	37.3
	旱田	26.1
	林	0.18
臺中廳	水田	17.3
	旱田	21.6
	林	0.08
南投廳	水田	50.4
	旱田	25.0
	林	0.01
嘉義廳	水田	70.8
	旱田	23.3
	林	0.33
臺南廳	水田	47.0
	旱田	4.76
	林	0.01
阿緱廳	水田	37.2
	旱田	10.2
	林	0.0003
澎湖廳	旱田	100.0

據各廳林野調查結果製成，資料來源：臺灣總督府殖產局，《臺灣林野調查事業報告》，

殖產局出版，第162號（臺北：臺灣總督府，大正4年），頁88、91、94、97、100、103、106、110、118。

從【表一】看來，訊問中對於革命政權的憧憬，部分在於林地可以自由開墾。此外，在李佳霖的統計中，因為爭取田地和林地而參與事件的人數，占全部原因中最高百分比，約25.2%，就算第二和第三高的也都是經濟因素。¹⁰再看【表二】會發現，中部以北的民有地比例明顯大於中南部，尤其像阿猴廳民有林地百分比幾乎等於零。據此，或許可稍微理解該事件爆發的原因和位置，以及參與者為何多以中南部人為主。

誠如蔡錦堂所言：「（爆發該事件）直接的動機可說是因林野調查沒收了（農民的）土地」。¹¹從時間看來，調查時間結束恰好是事件發生前一年；從環境來看，書中也提及該地與山林資源相互依存度高，無法提出土地證明的人民將失去財產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人民為保護自己的利益，於是加入了抗日的陣營。若是該論點可以成立的話，那麼應將歷來因林野調查而發生的事件，如竹林事件等，綜合而全面式地探討，不再僅是將「噍吧哖事件」以孤立的事件視之。

3. 西來庵是瘟神廟或鸞堂？

本書認為西來庵是座從事扶乩的瘟神廟，乍看之下似乎提出與前人不同的新穎看法，¹²但細究論證的過程，卻未有更詳細的說明。事實上，欲定義該廟性質，須從當時歷史情境判斷。據王見川的研究，在大正以前，西來庵確實有祭拜除瘟、開堂、繞境、出海等活動，當時《臺灣日日新報》亦記載此盛大儀式。¹³直至大正

10 李佳霖，〈武裝抗日下之農民運動：以西來庵事件為例〉，頁95。

11 蔡錦堂，《日本帝國主義下臺灣の宗教政策》（東京都：同成社，1994年），頁53。

12 認為其為鸞堂的有：李世偉，《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9年）；江燦騰，《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》（臺北：南天書局，2001年），頁152；認為是齋教的有：李添春，《臺灣省通志稿：人民志宗教篇》（臺北：臺灣文獻委員會，1957年），頁40-42；王志宇，《臺灣的恩主公信仰：儒宗神教與飛鸞勸化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7年）。

13 《臺灣日日新報（漢文版）》，〈迎神瑣說〉，明治31年9月13日。《臺灣日日新報（漢文版）》，〈落成建醮〉，大正4年5月19日。

初年，蘇有志、鄭春亨、蔣福五等人出資擴建廟宇，¹⁴之後積極擴大內部的扶鸞活動，發行鸞書《警心篇》，¹⁵建立扶鸞組織，至此西來庵儼然具有鸞堂的性質，惟仍有祭拜瘟神的儀式。要之，大正年間西來庵從瘟神廟逐漸地發展成以鸞堂性質為主的廟宇。所以欲定義該廟屬性，應對照時空環境才能理解。當然，作者定義該廟性質，或許源於自身的田野經驗，惟經驗尚須與史料相互印證才是。

再者，本書在描述人員招募時，認為菁英網絡是重要的因素，但筆者以為鸞堂之間的聯繫或許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。因此，若全面探討當時鸞堂分佈的情況，或許可以解決西來庵如何與其他地方取得聯繫。總之，筆者以為這很有可能不只是菁英網絡發揮作用，鸞堂間的交流也是值得思考的重點。

4.人口增減重建的運用

既然利用戶口重建人口概況，而且也提及當地的經濟結構和菁英網絡，那是否應該更著重於事件後的影響，就文章看來，重建人口的篇幅完整，但是影響的論述略嫌過少。特別是，當男女人口比例失衡後，既然論及寡婦從事其他產業的情況，那麼該地是否有因女性相對增多而出現新興產業呢？再者，西來庵事件中不乏有地方菁英的參與，那麼事後該地菁英結構是否有所改變？或者繼續維持自己的社會地位？例如，張阿賽雖曾招募人員，但是資料顯示，他除了從明治43（1910）年到大正4（1915）年擔任外礁吧咩區區長，¹⁶因參與該事件大正5年並無擔任任何職位。被判無罪後，¹⁷從大正6年至大正8年仍繼續擔任內新化區區長，¹⁸大正9年返回擔任

14 王見川，〈西來庵事件與道教、鸞堂之關係〉《臺北文獻》，直字120期（臺北，1997年），頁71-91。

15 林漢章，〈余清芳在西來庵事件中所使用的善書〉，《臺灣史料研究》，第2期（臺北，1993年），頁116-122。

16 《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》（明治43年），頁338、（明治44年），頁353、（明治45年），頁414、（大正2年），頁259、（大正3年），頁270、（大正4年），頁273。

17 Paul Kantz, *When Valleys Turned Blood Red: the Ta-pa-ni Incident in Colonial Taiwan*, pp. 199.

18 《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》（大正6年），頁299、（大正7年），頁314、《臺灣總督府職員錄》（大正8年），頁349。

外噍吧嘰區區長，¹⁹大正10年至昭和4年擔任玉井庄庄長。²⁰這只是個持續維持自身社會地位的例子，本書雖一直提及菁英網絡的作用，但是對事後的改變甚少提及。

5. 戰後關於西來庵的歷史記憶與紀念物之意義

作者雖以「歷史三調」為參考，但本書除了處理事件、經歷和神話以外，還處理一項很重要的課題，亦即中國統治當局日後對於義和團事件的理解和運用。例如，書中提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時，也曾經將義和團事件中抵抗洋人的事蹟解讀成反抗帝國主義，以利於國家的建立。²¹但是在書中卻少見這類論述的發揮，尤其作者自身也提到戰後忠烈祠的建立，人民不願回憶這段往事的口述紀錄，還有作者也評論以往研究西來庵事件都陷入了國族主義，那麼背後的原因是什麼？例如，沈松僑研究民國時期關於民族英雄人物的建構，²²以及當時對黃帝紀年與孔子紀年的激烈辯論；²³或者如何義麟透過史料的耙梳，重新解讀羅福星在臺灣的革命事業；²⁴國外研究如崔貞茂研究1980年代的韓國光州事件中，那些犧牲的民眾事後被知識分子奉為爭取國家統一的民族聖徒。²⁵綜上所言，那麼西來庵事件在戰後又如何被理解呢？這些在日人眼中的叛亂者，為何在戰後被視為忠烈義士。蔡錦堂曾言：「西來庵事件不能全然以『回歸祖國』言之」，²⁶這句話暗示了早期研究西來庵事件時背後的思想脈絡。

筆者以為除了透過紀念碑、廟宇外，還可以重新考察關於西來庵的研究，以

19 《臺灣總督府職員錄》（大正9年），頁361。

20 《臺灣總督府職員錄》（大正10年），頁334、（大正11年），頁350、（大正12年），頁363；
《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》（大正13年），頁373、（大正14年），頁360、（大正15年），頁370、（昭和2年），頁391、（昭和3年），頁414、（昭和4年），頁433。

21 Paul A. Cohen, *History in three keys: the boxers as event, experience, and myth*, pp. 241-251.

22 沈松僑，〈振大漢之天聲：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，第33期（民國89年6月），頁77-158。

23 沈松僑，〈我以我血薦軒轅：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〉，《臺灣社會研究季刊》，第28期（1997年12月），頁1-77。

24 何義麟，〈戰後臺灣抗日運動史の構築：羅福星的革命事績を中心に〉，五十嵐真子，三尾裕子編，《戰後臺灣における「日本」：植民地経験の連続・変貌・利用》（東京：風響社，2006年），頁217-250。

25 Chungmoo Choi, "The Discourse of Decolonization and Popular Memory," in Tani E. Barlow, ed. *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* (Duke University Press, 1997), pp. 349-369.

26 蔡錦堂，《日本帝國主義下臺灣の宗教政策》，頁52。

及教科書、報章雜誌、新聞媒體、小說中關於該事件的描述。例如，本書常徵引的《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》，「抗日革命」背後的命名邏輯為何？雖然在原始檔案中確實常出現「抗日」、「革命」等字眼，但是這些字眼的出現，也時常伴隨著「匪徒」、「匪首」等，那麼至戰後「匪徒」等字眼，是否也由於政治因素而被選擇性地遺忘？再者，稱為「余清芳事件」，是從戰後才開始，²⁷這是否也為了刻意塑造先烈而創造的名稱？

教科書部分。直到近年，三民版等教科書才將林野調查列入事件爆發的主要原因。²⁸但在過去幾年的教科書（如【表三】），論述幾乎都處在「抗日思維」的脈絡裡，其中康熙版認為該事件具有「民族意識」，翰林版將其視為「民族革命性質」的抗日事件，試問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敘述呢？

表三、教科書中關於西來庵事件敘述之整理

	版本	內容
國中歷史	南一	此一時期，各地仍不斷有武裝抗日發生，其中以具有民族革命性質的「苗栗事件」，以及和宗教傑涉有關的「西來庵事件」規模較大。
	翰林	西元1907年至1915年為後期，此時期由於受到中國革命運動的影響，發生了十餘起具有民族革命性質的抗日事件，其中最具規模的是西元1915年余清芳等人領導的噶吧嘑事件（又稱西來庵事件或玉井事件）
	康軒	日本統治初期，臺灣的武裝抗日行動從未間斷，其中以苗栗事件、西來庵事件規模較大。

27 池田敏雄氏，〈柳田國男と臺灣－西來庵事件をめぐる一〉，頁465。

28 「武裝抗日行動再起的原因，在於日本進行林野調查，掠奪許多林野土地，以及日本資本在臺灣擴張，損害臺灣人的生計，因而引起反彈。」《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一冊》，三民版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），頁64。

高中歷史	三民	噍吧哖事件是漢人大規模武裝抗日的最後一次，又稱西來庵事件
	龍騰	1915年的余清芳事件，是1902年以來，規模最龐大，犧牲也最慘烈的抗日活動。
	南一	大部分的抗日行動規模都不大，且往往於計畫階段即被破獲。較具規模者為1913年羅福星領導的苗栗抗日事件與1915年余清芳、羅俊、江定等人領導的西來庵事件。
	康熙	在1907年至1915年間先後爆發時多起具有民族意識的抗日事件。其中，以1913年羅福星發動的「苗栗事件」、1915年余清芳等人領導的「西來庵事件」規模較大。

《南一版國中社會（一上）》（臺北：南一書局，2005年），頁148；《翰林版國中社會（一上）》（臺北：翰林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84；《康軒版國中社會（下）》（臺北：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08年），頁74；許雪姬主編，《三民版高中歷史（上）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2年），頁87；李孝悌，《龍騰高中歷史（下）》（臺北：龍騰書店，2002年），頁174；林能士主編，《南一版高中歷史（下）》（臺北：南一書局，2004年）；王仲孚主編，《康熙版高中歷史（下）》（臺北：康熙圖書網路股份有限公司，2006年），頁89。

其他，如小說《結義西來庵：噍吧哖事件》²⁹、《勇士當為義鬥爭：血戰噍吧哖》³⁰、傳記《余清芳傳》³¹、電影《血戰噍吧哖》³²等，其中關於西來庵的認識，是否有共同的地方，而這又是為什麼呢？特別是《結義西來庵：噍吧哖事件》和《余清芳傳》都被編入先烈先賢的傳記叢刊，這背後的編書邏輯與前述所言是否都有一種「抗日史觀」？這皆是探討「先賢先烈」的途徑之一。

6. 其他史料的運用

（1）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》。雖然《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》將所有檔案裡的相關資料收編殆盡，但仍須以第一手史料為主，不僅可直接解讀原檔，甚至可以查詢相關人物的背景，以瞭解他們在當地的活躍情況，如張阿賽就曾以申請開墾地的方式取得土地。³³

29 李能棋，《結義西來庵：噍吧哖事件》（臺北：近代中國出版社，1977年）。

30 洪明燦，《勇士當為義鬥爭：血戰噍吧哖》（臺北：遠流出版社，1997年）。

31 程大學，《余清芳傳》（臺中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78年）。

32 1958年華星電影公司出版之臺語黑白片，全長107分鐘，原片名為《西來庵事件》由何基明導演，編劇為賴炳和和賴明煌，主要演員有歐威、何玉華、林琳、洪洋等人，首映日為1958年8月26日。周宗賢，《臺南縣噍吧哖事件之調查研究》，頁239。

33 〈豫約開墾地成功賣渡許可（張阿賽；外一名）〉，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》，第6128冊，第4號，15年保存，大正4年（1915年）。

(2) 相關雜誌如《臺灣警察協會雜誌》、《臺灣警察時報》、《新臺灣》。雜誌裡有很多相關文章，如苗栗事件、西來庵事件後，臺灣地方法院檢察官長小野得一郎曾發表〈司法警察改革意見〉一文，認為目前正值司法警察改革之時機，應斷然放棄「預設搜查犯人主義」，改為「科學的搜查犯罪事實主義」，自白書應避免強迫取得，而宜講究科學證據。「科學搜查」要素有二：調查犯罪事實和被害者。³⁴筆者以為這是一篇很有意義的文章，若從法律史的角度切入，該事件或許有另一層含義。

再者，從當時文章可以檢視時人對於該事件的觀感，如冬峰生在〈雷同性と煽動〉文中，³⁵以歷來臺灣的暴動為例，分析臺灣人參加動亂的盲從性；或者像諏訪鶴雄描述西來庵事件，充斥著迷信和暴力，同時也描述當時對日人的屠殺實況。³⁶甚至有一篇以〈西來庵事件の真相〉為題，描述事件發生過程，文中充斥「迷信」、「煽動」、「暴力」、「陰謀」。這些文章皆可反映當時該事件給予人的印象，³⁷恰可與戰後的印象對照。

整體而言，本書從社會史角度切入西來庵事件，就處理方式而言，給予讀者新思維，雖有些許瑕疵，但是透過這樣的視角，也值得讓我們重新思考其他事件，特別是歷史、經驗和神話中的事件所具有的不同面貌。（責任編輯：葉健青）

34 小野得一郎，〈司法警察改革意見〉，《臺灣警察協會雜誌》（臺北：臺灣警察協會，大正6年6月20日），頁25-29。

35 冬峰生，〈雷同性と煽動〉，《臺灣警察協會雜誌》（臺北：臺灣警察協會，昭和2年7月1日），頁20-22。

36 諏訪鶴雄，〈本島犯罪の種相〉，《臺灣警察時報》（臺北：臺灣警察協會，昭和13年4月10日），頁37。

37 翠巖洞，〈西來庵事件の真相〉，《新臺灣》（大正5年3月10日），頁4-5。